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位错效应*



李 纾[1] 刘 欢[1,2**] 郑 蕊[1**]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南昌大学 南昌 330031

摘要 理解并有效评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对推进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人们对城镇化的评估结果却似乎与其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客观指标或主观指标）有关。通过对以往研究的综述，该研究发现，尽管评估地区的客观指标（如，文盲率）随着城镇化程度的升高而阶梯状改善，但是民众的主观指标却并没有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住地依恋的得分上大致相当，而原本预期得分介于两者之间的城镇居民则在住地依恋的得分上最低，该研究称这一“V形”现象为“城镇位错效应”。进一步的文献综述与调查分析显示，民众的住地依恋主要受到人口统计学指标、人际关系与物理环境的影响。建议在城镇化的评估中，结合使用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

关键词 城镇位错效应，城镇化，住地依恋，主客观指标，社会支持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7.02.003

城镇化发展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改造自然能力提高的重要标志，我国目前正处于高速的城镇化过程中。在1978—2013年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快速增至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升至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至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 173个增至20 113个。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达54.77%，超过全球53%的均值，呈现出起点低和发展速度快的特点。随着城镇建设不断推进，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经济等诸多客观社会指标上也均有所提高。统计数据显示，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民众的各项客观指标皆呈现出阶梯状的改善趋势。例如，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014年农村、城镇、城市15岁以上文盲比例分别为7.88%、3.79%和1.88%；农村、城镇、城市人口的死亡率分别为8.18%、5.05%和3.83%[1]（图1）。这一结果提示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为保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带来机遇。

*资助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09FY110100），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KSCX2-YW-R-13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871110），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特别基金及中科院心理所青年科学家项目（O8CX025002、O9CX104010）
** 通讯作者
预出版日期：2016年11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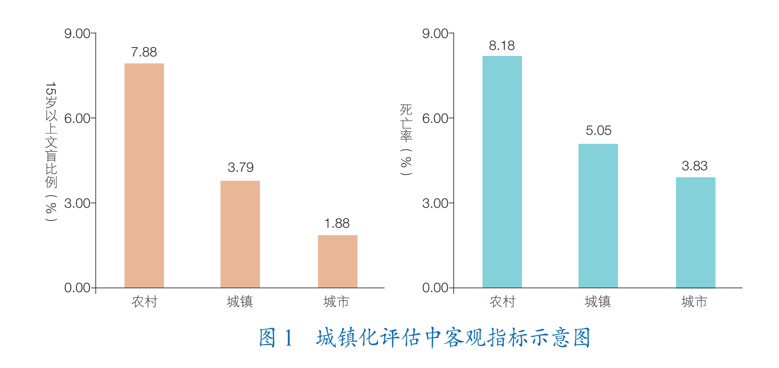


图 1　城镇化评估中客观指标示意图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自然而然地推测出民众的主观心态也如各项社会指标一样，随着城镇化的脚步而逐渐增长呢？事实上，城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变迁，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城市或城镇对传统农村社区的接替，在社会主体层面上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型；它不仅体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文化模式的转换，而且还体现为民众心理状态上的嬗变和转型[2]。Easterlin[3]早在 1974 年的经验研究中就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幸福悖论”，即居民的幸福感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Easterlin[4]在 2012 年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理论：中国最近 20 年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民众生活满意程度的相应提升。

以上分析表明，在评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何种指标，似乎会为我们带来不同答案。如果采用客观社会指标，城镇化的发展显然为民众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与更好的生活环境；然而如果采用主观心理指标评估，我们却发现城镇化似乎并没有让城镇居民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受。古老的《伊索寓言》中有一个故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城市老鼠和乡村老鼠互相倾慕对方的生活，于是彼此走动，发现由于住地改变而产生的巨大环境差异。在体验了城市老鼠富裕的生活之后，乡村老鼠感慨道：与其紧张焦虑地生活在城市中享用美食，还不如回到乡下去过平静的生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精神安逸或比物质充裕更为重要，这点启示对于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的中国似乎尤为重要。鉴于新型城镇化秉持以人为核心的原则，提升居民福祉才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由此可见，在城镇化评估中，主、客观指标均不可偏废，当地居民对其住地的评价亦是评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

1 主观指标与住地依恋

以往研究者一般采用客观指标来对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进行评估。例如，我国的统计年鉴中常用人口比重法度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体人口的比重，也有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是反应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5]。鉴于该指标过于单一化，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城镇化的多维特点，亦有研究者将人口规模与密度、用地规模与密度、政府投入、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和环境等指标纳入对城镇化水平的评定中[6-8]，指出城镇化应包括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 3 个维度。由此可见，目前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状况的评估主要局限于以客观经济为主的硬指标，而较少关注民众的心理问题。然而，关注民众的心理问题正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秉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关键体现。

世界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不断增长并不一定给民众带来对等的幸福，研究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采用经济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出社会的真实状况，因此，Campbell[9]，Andrews 和 Withey[10]等人率先将对民众主观心态的考察引入到对社会发展的评价中，并相对于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指标（objective indicator），将之命名为主观指标（subjective indicator）。Veenhoven[11]认为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差异主要有两方面：（1）两者所测量的事物不同。客观指标测量的是不受民众主观感受所影响的客观事物，而主观指标测量的恰恰是民众感受本身。（2）两者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不同。客观指标的评估来源于客观具体的观察统计，而主观指标则主要来源于民众的自我报告。比较来看，客观指标更适用于对具体细节的描述，其结果报告往往局限于客观观察的结果，而如若要对政策本身的制定提出综合性建议，还应同时考虑客观、主观两种指标的结合使用。在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方面，以社会心理为主

要考察对象的主观指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11]。事实上，研究者均认可主观指标在衡量社会发展上有着突出重要的价值，对其有效性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对自我报告法本身的质疑。

评估社会环境改变所导致的主观心理感受的指标中，研究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有关地区和个体之间心理联结，并采用多种概念来描述这一联结，如地区感受（sense of place）[12]，地区依赖（place dependence）[13]，社区感（community sentiment）[14]，住地依恋（place attachment）[15-19]，住地认同（place identity）[20-22]。其中，住地依恋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可，并被作为描述个体与地区联结的核心概念。Scannell 和 Gifford[23] 系统梳理了住地依恋的定义并提出住地依恋的 PPP（Person，Process，Place）模型，他们认为所谓住地依恋是指“个体对于某一特殊地区的情感联结”，他们认为住地依恋包含了人、过程和地点 3 个维度。其中，人是依恋的主体，地点是依恋的对象，人和特殊地点之间的互动就是依恋产生的过程。

Scannell 和 Gifford[23]指出研究者之所以对住地依恋有着很高的研究热情，是因为该变量在政策制定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首先，住地依恋能够影响民众的安全感[15,24-27]。研究者认为个体与其所在地区之间的联结是积极的，这种联结能够降低他们的风险知觉，使得他们更愿意生活在此地[23]。其次，住地依恋能够给民众带来归属感[15]。这种家园般的感受，能够提高民众整体的生活满意度。最后，住地依恋可以预测民众是否愿意为当地作出贡献。也就是说它可以预测民众参与本地区有关活动的积极性[18,28,29]，对当地公共区域的使用状况[30-32]以及对当地环境的保护性行为[33-35]。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有关住地依恋的测量大都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进行，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民众的住地依恋感一般存在于潜意识，只有当个体离开所在地时，这种依恋感才得以表达，因此应考虑采用内隐的方法对住地依恋进行测量[20,36,37]。在已有的研究中，Hidalgo 和 Hernández[37] 采用情景模拟法，通过让被试想象自己离开所在地的情景来测量其住地依恋感。Boğaç[38] 则采用画图投射法来对个体的地区认同进行测量。我国学者连淑芳[39]采用 IAT（内隐联想测验）对上海人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认知状况进行了测量。而在我们的研究中[40]，采用投射法测量民众的住地依恋水平，即并不直接询问受访者对住地的看法和态度，而是要求受访者对与自身生活关系重大的事件作出决策：终身伴侣的选择，重生地的选择，希望子女掌握的方言，以及对外地人侮辱本地人的情绪反应。如果受访者具有强烈的住地依恋，那么他们就能在这些重大生活问题上选择为自己的住地背书（projected endorsement），即：希望选择本地人做伴侣，来世再作本地人，让孩子掌握本地方言，并对外地人侮辱本地人的言语表达强烈的情绪反应。

2 城镇位错效应

采用上述住地依恋评估量表，我们对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我国城市、城镇、农村居民进行了测量[40]。该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在全国范围内对处在不同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的住地依恋前后开展了两轮入户调查。第一轮抽样调查共涉及 7 座城市、7 个乡镇和 10 个农村，样本量为 3 716 人。第二轮抽样调查选取了与第一轮抽样完全不同的 3 座城市、3 个乡镇和 3 个农村，样本量为 1 452 人。两轮抽样总计样本为 5 168 人。

两轮调查获得了非常一致的结果，即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影响之后，处于城镇化进程 3 个阶段的居民在住地依恋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一轮：$F(2,3609) = 62.65$, $MSE = 0.44$, $p < 0.001$, $\eta^2 = 0.03$；第二轮：$F(2,1446) = 15.00$, $MSE = 0.47$, $p < 0.001$, $\eta^2 = 0.02$]，事后检验发现城镇居民对住地的依恋程度显著低于城市和农村居民（LSD 检验，两轮 $ps < 0.001$），而城市和农村居民对于住地的依恋程度差异不显著（第一轮，$p = 0.76$；第二轮，$p = 0.85$）。

如果按照教育、医疗以及经济收入等硬指标，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各项指标应呈阶梯状改善（图 1）。来自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居民自评的人均月收入水平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呈现出阶梯上升的趋势[40]。根据常识或直觉，我们或自然而然地推测城市居民的住地依恋应该高于城镇居民，而城镇居民的住地依恋应该高于农村居民。然而，依据投射测验的结果，城镇居民对住地的依恋反而非逻辑地“掉”了下来（图 2），显著地低于另外两个区域，呈现出“软硬”指标的错位以及“常识预期”与“实际测量”的错位，我们将此现象命名为“城镇位错效应”（town dislocation eff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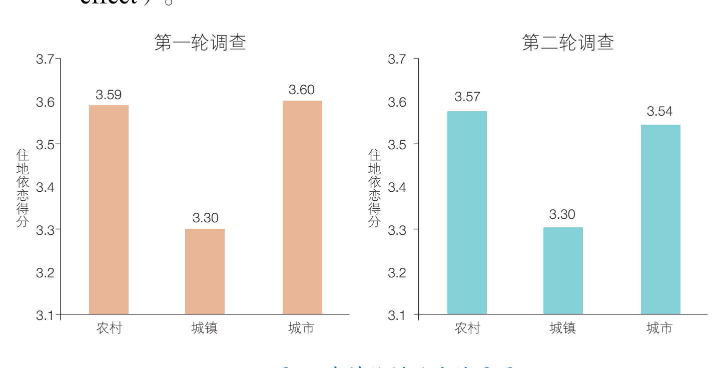


图 2 城镇位错效应结果图
1—5 分制计分，分数越大表明越依恋本地区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也并非孤证，以往有关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民众心态的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例如，有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市居民[41-43]。农村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农民对自己未来收入和生活预期相较于城市居民更低，因此也就更容易实现；当城市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居民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与他人比较，而随着经济发展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增大，这也是导致城市居民幸福感较低的主要原因[43]。另外，有关群体事件的报告指出，在 2012 年发生的群体事件中，城镇居民参与的比例略高于农民，说明城镇化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44]。该结果可以为城镇化进程的评估提供独特的评价视角，或能帮助我们了解、确认诸多与地域有关的真实依恋感。

3 住地依恋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民众的住地依恋水平，我们梳理出影响住地依恋的相关因素，冀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培养住地依恋以及提高居民幸福感等问题提供启示。尽管有关住地依恋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少见[45]，综合以往研究，我们认为目前研究者关注的影响因素包括 3 个方面。

3.1 人口统计学变量

（1）出生地。很多研究都认为个体所在地区是否是其出生地，会显著影响其住地依恋的程度。例如 Lalli[46]的研究表明出生在本地的居民比出生在其他地区的居民对本地的认同度更高，而且这一关系与居住时间无关。黄飞等人[47]也发现本地人比外地人有更高的地方认同水平，这种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异在我国的西部边疆地区样本上更为明显。Casal 等人[48]调查了巴黎和马德里的居民选择何地度过晚年的意愿，发现有 20.8% 的个体选择出生地作为其度过晚年的地点。出生地影响住地依恋的可能原因是，儿童时期对居住地的积极情感体验会内化为潜意识的模式，帮助其养成对居住地的长时间的积极主观情感联结，即形成住地依恋[49]。

（2）居住时间。居住时间对住地依恋的影响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变量：即居住时间越长，其住地依恋度高[28,45]。以往研究表明个体的年龄本身并不能预测其住地依恋度，影响个体住地依恋度的是居住时间。居住时间也会影响个体对第二故乡建立住地依恋感[50]，而是否在第二故乡拥有自己的房产与住地依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51]。也有研究者发现个体在建立与地区之间的情感联结时并不需要太久的居住时间[52,53]，但是建立认同时这一点则是必须的。

（3）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发现文化水平低的个体住地依恋度更高[18]，研究者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文化水平低的个体，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较低，很难被其他社会群体

所接受[28,54,55]，所以住地依恋对于他们来讲更为重要。而高社会经济地位（包括高教育水平）对个体的住地依恋的影响是多重的：流动性更强且其社会关系更多在社区之外，会减弱住地依恋度，而拥有自己的房子会增加其住地依恋度[45]。

3.2 社会支持变量

研究者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发展其住地依恋的关键因素，良好的人际环境可以帮助个体建立起对于朋友圈所在地区的认同，个体在该地区交到的朋友越多，那么他也就越不愿意离开此地[28,45,56]。Hidalgo 和 Hernández 等人[37]也指出个体对于地区的社会性联结要比他们的地理性联结更为重要，而这一点对于女性来说显得尤为重要[37,57,58]。对于年轻的移民来说，新居住地的朋友数量和情感联结是其对新居住地产生依恋的主要影响因素[45]。Lorenza 等人[59]以来自 13 个国家的青少年为对象，调查了其住地依恋、社区安全感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住地依恋程度越高，认为邻里之间更加和睦，就会觉得社区更加安全。

在有关城镇位错效应的研究中，我们同样证明了社会支持的重要作用。在研究开展之初，我们以为城镇居民之所以住地依恋水平较低，是因为城镇化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导致城镇居民更害怕风险和损失，然而中介分析却显示导致城镇居民住地依恋得分较低的真正原因是社会支持水平的下降，即城镇化发展的程度会影响民众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影响到民众的住地依恋水平[40]。差异检验显示城镇居民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地低于城市和农村居民（$F(2,1446) = 27.72$, $MSE = 0.30$, $p<0.001$, $\eta^2 = 0.11$, by ANCOVA）（图 3）。以往研究者也指出移民和高速工业化所导致的城市化破坏了农村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城市民众之间表现出更多的疏离行为，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住地依恋感[46,60,61]。

3.3 物理环境变量

人口学变量和社会关系都是影响住地依恋中与人相关（person-type）的因素，影响住地依恋的因素中还有一类是与住地（place-type）相关的因素，被称为是物理环境因素（physical/environment predictors）。

众多研究发现，公共绿地、社区的安静和拥挤程度、封闭式的小区等物理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到对居住地的依恋程度。无论人们对公共区域的使用频率如何，社区中公共开放区域和商店都有利于社区感的建立[62]。所在社区的安静程度、拥挤程度以及知觉到的危险程度都会影响居民对社区的依恋程度[63,64]。对于年长的移民来说，现有居住地相比于原居住地物理环境的改善是影响其对现有居住依恋度的主要因素[45]。建筑的特征、道路、绿地、交通服务、环境健康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城市居民对环境质量的知觉（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PREQ）从而影响其住地依恋[65]。社区环境中提供一个可供休闲且受人喜爱的咖啡馆[66]，或拥有便捷的服务设施也会增加居民对社区的依恋程度[64]。

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物理环境的变化需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因为这种变化也会影响居住者的主观幸福感和住地依恋度[23]。von Wirth 等人[67]发现，当面对城市中物理环境的变化时，如果居民觉得这种变化是对环境的改善且没有影响其熟悉度，居民的住地依恋度会更强。因此，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物理环境变化对居民住地依恋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物理环境因素会影响到住地依恋，而住地依恋也会影响到居民对物理环境的主观评价，两者之间存在相关，但是具体的因果关系还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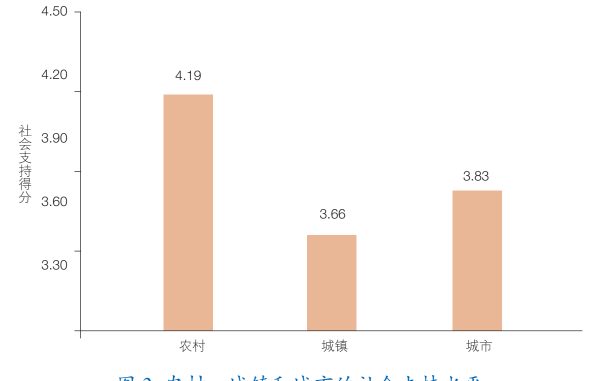


图 3 农村、城镇和城市的社会支持水平

进一步证实[45]。

4 政策建议

4.1 在城镇化的评估中，注重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

由上述分析可知，以住地依恋为代表的主观指标，在对城镇化发展的评估中起着客观指标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建议将民众心理城镇化水平也纳入到城镇化的评估中来（例如将住地依恋作为评估地区城镇化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并建议在地区层面增加对民众心态的民意调查工作。通过对民众住地依恋状况的长期监控和评估，可以准确地反映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民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掌握民众社会心态的波动及其规律，为各级政府调整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更好地满足民众需求，促进社会和谐。

4.2 促进城镇居民人际互动，增强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因为一个人，爱恨一个城。”虽是俗语，但却恰恰点明了社会网络支持系统对于人们住地依恋的重要影响作用，使得人们对地区产生依恋的并不仅仅是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更是生活于其中的人际支持网络。因而，我们建议从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两方面改进民众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增强民众的住地依恋水平。

建立增强“社会支持”的现实（面对面）交往平台。Lalli[46]指出如果能够在构建城镇的过程中把民众的舒适度也定为重要的发展目标，那么民众也可以对城镇化产生更为积极的认同感。以往研究表明，除了城市中各项硬件建设之外，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如公共绿地、公共小花园和社区活动中心等）可以通过增加人与人相互交往的机会，从而提升民众的住地依恋。因此，我们建议在城镇化进程中，尊重原有村落划分，增强公共空间建设，从而促进民众从原有的传统大家族居住环境中过渡到城市中核心小家庭的居住环境。

打造增强“社会支持”的虚拟社区交往平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虽然从户籍上转变为城市居民，享有一般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但是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的改变，打破了原有大家族一起生活的交往模式，导致居民原有的社交网络面临重构，居民对地方的依恋感也随之降低。为了拓展居民的社会支持系统，社区服务人员除了可以通过举办定期讲座和各类文化活动等传统方式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邻里间的互动，亦可以通过采用新媒体技术，例如采用微信群等方式在社区中打造虚拟社区交往平台，并通过建立涉及老百姓衣食住行各领域的功能性微信群（如海淘群、摄影群、理财群、健步群、育儿群、广场舞群、养生保健群等）促进线下的人际交往，从而避免由于居住模式改变所导致的空间壁垒与人际疏远。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2 孟祥斐, 华学成. 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江苏淮安市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学海, 2008, (2): 23-30.

3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David P A, Reder M W, Eds. Nations &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89-125.

4 Easterlin R A, Morgan R, Switek M, et al.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25): 9775-9780.

5 薛德升, 曾献君.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地理学报, 2016, 71(2): 194-204.

6 刘思. 现代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统计与决策, 2006, (10): 68-69.

7 台冰, 李怀祖. 综合城市化水平测度研究. 学术界, 2006, (5): 190-194.

8 都沁军, 武强. 基于指标体系的区域城市化水平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 2006, 13(5): 5-8.

9 Campbell D T.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evolution and between psychology and moral tradition. Zygon, 1976, 11(11): 167-208.

10 Andrews F M, Withey S B. Developing measures of perceived life quality: results from several national survey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4, 1(1): 1-26.

11 Veenhoven R. Why social policy needs subjective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1, 58(1-3): 33-46.

12 Jorgensen B S, Stedman R C. Sense of place as an attitude: lakeshore ow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proper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3): 233-248.

13 Stokols N, Shumaker S A. People in places: a transactional view of settings. Cognitio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1981, 441-488.

14 Hummon D M. Community attachment: local sentiment and sense of place. Human Behavior &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 Research, 1992,12: 253-278.

15 Giuliani M V. Theory of attach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Psychological Theories for Environmental Issues. Aldershot: Ashgate, 2003. 137-170.

16 Hernández B, Carmen Hidalgo M, Salazar-Laplace M E, et al.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natives and non-nativ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7, 27(4): 310-319.

17 Knez I. Attachment and identity as related to place and its perceived climat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5, 25(2): 207-218.

18 Lewicka M. Ways to make people active: role of place attachment, cultura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5, 25(4): 381-395.

19 Manzo L C. Beyond house and haven: toward a revisioning of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plac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 23(1): 47-61.

20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Kaminoff R.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83, 3(1): 57-83.

21 Twigger-Ross C L, Uzzell D L. Place and identity process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6, 16(3): 205-220.

22 John D, Kevin D. Displacing place-identity: a discursive approach to locating self and oth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0, 39 (Pt1): 27-44.

23 Scannell L,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0.

24 Fried M.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of pl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0, 20(3): 193-205.

25 Fullilove M T. Psychiatric implications of displace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sychology of 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96, 153(12): 1516-1523.

26 Brown B, Perkins D D, Brown G. Place attachment in a revitalizing neighborhood: individual and block levels of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 23(3): 259-271.

27 Billig M. Is my home my castle? Place attachment, risk perception, and religious faith. Environment & Behavior, 2006, 38(2): 248-265.

28 Rollero C, De Piccoli N. Place attachment, ident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 perce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2): 198-205.

29 Vugt M V.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moderat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in a natural social dilemma: water conservation.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1, 27(11): 1440-1449.

30 Kyle G, Graefe A, Manning R. Spatial variation in level of place attachment//2005 Proceedings of the 2004 Northeastern Recreation Research Symposium. Gen. Tech. Rep. NE-326. Pennsylvania: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Northeastern Research Station, 2005. 14-19.

31 Moore R L, Graefe A R, Gitelson R J. Living near greenways:

neighboring landowners' experiences with and attitudes toward rail-trails. Journal of Park &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1994, 12(1): 79-93

32 Williams D R, Stewart S I. Sense of place: an elusive concept that is finding a home in ecosystem management. Journal of Forestry, 1998, 96(5): 18-23.

33 Kyle G, Graefe A, Manning R, et al. Effect of activity involve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recreationists' perceptions of setting density.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4, 36(Second Quarter): 209-231.

34 Vorkinn M, Riese H.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a local context: the significance of place attachment. Environment & Behavior, 2001, 33(2): 249-263.

35 Stedman R C.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place: predicting behavior from place-based cognitions, attitude, and identity. Environment & Behavior, 2002, 34(5): 561-581.

36 Brown B B, Perkins D D. Disruptions in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Springer US, 1992.

37 Hidalgo M C, Hernández B. Place att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3): 273-281.

38 Boğaç C. Place attachment in a foreign settle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9, 29(2): 267-278.

39 连淑芳. 内-外群体偏爱的内隐效应实验研究. 心理科学, 2005, 28(1): 93-95.

40 Wang F, Li S, Bai X W, et al. Town mouse or country mouse: Identifying a town dislocation effect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PLoS One, 2015, 10(5): e0125821.

41 贾巧枝. 成都市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 2009.

42 曾慧超, 袁岳, 高萍. 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 创造, 2005, (4): 64-64.

43 罗楚亮.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经济学, 2006, (3): 817-840.

44 法制网.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 [2012-12-27]. http://www.legaldaily.com.cn/The_analysis_of_public_opinion/content/2012-12/27/content_4092138.htm.

45 Lewicka M. What makes neighborhood different from home and city? Effects of place scale on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35-51.

46 Lalli M. Urban-related identity: theory,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finding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2, 12(4): 285-303.

47 黄飞, 周明洁, 庄春萍, 等. 本地人与外地人地方认同的差异: 基于四地样本的证据. 心理科学, 2016, 39(2): 468-473.

48 Casal A, Aragones J I, Moser G. Attachment foreve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temporal perspective, and choice of one's last resting pla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2010, 42(6): 765-778.

49 Morgan P.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22.

50 Aronsson L, Hall C M, Müller D K. Place attachment of vacation residents: between tourists and permanent residents// Tourism, Mobility and Second Homes: Between Elite Landscape and Common Ground. Bristol: Channelview Publications, 2004. 75-86.

51 Kelly G, Hosking K. Nonpermanent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and "sea change" communities. Environment & Behavior, 2008, 40(4): 575-594.

52 Bonaiutoa M, Aielloa A, Peruginib M. Multidimensional percep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9, 19(4): 331-352.

53 Harris P B, Brown B B, Werner C M. Privacy regul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predicting attachments to a student family housing facil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6, 16(4): 287-301.

54 Brown R, Williams J. Group identification: the same thing to all

people? Human Relations, 1984, 37(7): 547-564.

55 Ellemers N, Kortekaas P, Ouwerkerk J W. Self-categorization, commitment to the group and social self-esteem as related but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9(23): 371-389.

56 Low S M, Altman I.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Inquiry. NewYork: Plenum Press,1992.

57 Prezza M, Amici M, Roberti T, et al. Sense of community referred to the whole town: 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loneliness, life satisfaction, and area of residence.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1, 29(1): 29-52.

58 Tartaglia S.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a new model of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6, 34(1): 25-36.

59 Dallago L, Perkins D D, Santinello M, et al. Adolescent place attachment, social capital, and perceived safety: a comparison of 13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9, 44(1-2): 148-160.

60 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44(1): 1-24.

61 Milgram S.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cities. Science, 1970, 167(3924): 1461-1468.

62 Francis J, Giles-Corti B, Wood L, et al. Creating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ole of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2, 32(4): 401-409.

63 Tabernero C, Valera S, Vidal T.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f the neighbourhood on place attachment: the impact of the physical care of the neighbourhood. Estudios De Psicología, 2013, 34(3): 299-307.

64 Kamalipour H, Yeganeh A J, Alalhesabi M. Predictors of place attachment in urba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a residential complex case study.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35: 459-467.

65 Fornara F, Bonaiuto M, Bonnes M. Cross-validation of abbreviated 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PREQ)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NA) indicators. Environment & Behavior, 2010, 42(2): 171-196.

66 Lisa W P D. The coffee shop: social and phys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Interior Design, 2006, 31(3): 35-53.

67 von Wirth T, Grêt-Regamey A, Moser C, et al.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urban change on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6, 46: 67-82.

Town Dislocation Effect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Li Shu[1] Liu Huan[1,2] Zheng Rui[1]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urbanization and evaluating its effects are vital in formulating Chine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depend on the type of measurement used (adopt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es). Through a review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the objective index improved monotonically along with urbanization in China, whereas the subjective index, place attachment, did not improve along with the urbanization level in China. The assessment scores from the city dweller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ose in the country areas and, more surprisingly, bo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ssessment scores of the town dwellers, which were expected to fall between the assessment scores of the country and city dwellers. The present

study dubbed this V-shaped relationship the "town dislocation effect". Further literature reviews and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place attachment is affected mainly by demographic variables, social support,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people should focus on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dices in the assess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Keywords town dislocation, urbanization, place attachment, subjective & objective indices, social support

李 纾 中科院心理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新南威尔士大学）。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科院心理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创会主任，*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期刊顾问，《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副主编。在*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Thinking and Reason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等期刊发表行为决策相关论文约200篇。E-mail: lishu@psych.ac.cn

Li Shu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at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h.D. UNSW*). He is a State Council Expert for Special Allowance,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Committee of Psychology in Decision Mak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Consulting Editor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Associate Editor of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and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His published research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has appeared in more than five-dozen journals including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n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E-mail: lishu@psych.ac.cn

刘 欢 女，中科院心理所博士研究生，南昌大学讲师。研究兴趣包括损失规避、得失过程对决策的影响等。
E-mail: liuh@psych.ac.cn

Liu Huan Female, Ph.D. candidate of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ecturer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 of loss aversion and risky choice. E-mail: liuh@psych.ac.cn

郑 蕊 女，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包括住地依恋，行为决策等。E-mail: zhengrui@psych.ac.cn

Zheng Rui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aster supervisor.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behavior decision making. E-mail: zhengrui@psych.ac.cn